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论文

实事求是研究我军战史 的根本原则

军事科学院 沈宗洪 蒋仲安
王道平 刘国语

一九八三年十月 北 京

实事求是研究我军战史 的根本原则

军事科学院

沈宗洪 蒋仲安
王道平 刘国语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在这个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学术讨论会，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它将推动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促进军事科学的深入开展，以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加强我军战争历史研究，是当前军事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而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则是提高战史研究质量，达到战史研究目的的关键。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②我们党的历史表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得到发展，走向胜利；否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生曲折，蒙受损失。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不良影响遍及各个领域，我军战史研究工作也不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迅速拨乱反

正，把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引向蓬勃发展的道路，也正是恢复和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军战史研究，同样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达到预期的目的。现在，我们仅就在我军战史研究中怎样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讲几点粗浅的认识，以求教于到会的首长和同志们。

一、要从历史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研究我军战史，首先要尊重历史事实，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战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已经进行过的战争，它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战史研究的任务，是正确地反映战争的过程，总结战争的经验，揭示战争的规律，而战争历史的过程、经验和规律，都是客观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它，也不能主观臆造一个东西来代替它。正确地反映战争的过程，总结与揭示战争的经验 and 规律，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历史实际。这是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必须遵循的法则。

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就要占有大量史料。这是战史研究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步。离开了充分的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就成了一句空话。列宁说过：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③在战史研究中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就是占有丰富而真实的史料。然而，由于战争的紧张激烈，复杂多变，有些历史情况，当初并没有文字记载；即使有原始材料，它反映的情况有时也会带有局限性；再加上一些史料已经散失，这就给我们弄清战争历史面貌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去收集同研究我军战史有关的资料，诸

如战争中敌、我、友三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的资料，作战指导与作战经过情况的资料等等，并要花大力气对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校订、考证和整理工作，从而为战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从历史实际出发，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研究和现实需要的关系。过去，在“左”倾错误影响下，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林彪、“四人帮”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出发，打着“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等旗号，大搞实用主义，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它的流毒和影响，至今还需要我们加以肃清。研究我军战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是通过战史，反映出我军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光辉业绩，其中包括宣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从而教育和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二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作为指导我军当前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借鉴。从这里可以看出，战史研究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它和政治是密切联系的。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从当前政治需要出发，去任意解释和剪裁历史。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研究历史，必须反映它的本来面目，而不应该因政治风向变化而随意加以解释。对于历史人物的褒贬，同样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了要宣扬一个人或者要批判一个人而抓住一点，渲染夸大，也不能牵强附会，勉强联系。至于出于某种需要而任意杜撰和编造史实，那更是不能容许的了。研究历史经验，为的是当前和今后的运用。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考虑到当前和今后的需要，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及其实际存在的经验，任意加以拔高和编造。总

之，只有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总结了经验，揭示了规律，战史才能是一部“信史”，才能对当前和今后起到教育和借鉴的作用。

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还有一个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问題，这就是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有关我军战史的现成结论很多，有的出自党中央的指示和决议，有的出自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或当时各级领导机关的总结，有的是已经写成的战史和专家学者的看法。在战史研究中，很容易出现一种偏向，就是从现成的结论出发，到历史中去找些材料来加以证明，然后再回到原来的结论上去。这种做法既“保险”又“省劲”，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采用。其实，这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也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的唯物主义的观点”。④研究战史，要从史实出发，而不能从现成结论出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要求。对于过去的结论，我们无疑是要慎重对待的。特别是党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研究我军战史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写的战史和专家学者的看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它们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尽管其中许多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也还是要从史实出发，通过对史实的分析，去认识它的正确性。何况，其中有些结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照搬现成结论的做法，而要发扬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精神，按照毛泽东同志所历来提倡的去做，不从本本出发，而从实际出发。

二、要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实际联系起来

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我军战史，就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实际联系起来。毛泽东军事思想，既是我军战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又是我军战史研究的锐利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又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土壤，毛泽东军事思想之花就不可能产生，而没有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就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我军战争历史，是如此不可分割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战史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通过我军几十年的光辉战争历程，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客观地反映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学习和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研究我军战史的一项根本任务。

研究我军战史，不能停留在史料收集整理上“述而不发”。“史料即史学”的治史主张是不对的。满足于没完没了的繁琐考证，满足于史料的堆砌罗列，而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探讨事物的本质，这不是历史科学研究。占有史料，只是战史研究的感性认识阶段，还要提高和发展，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找出战争内部的必然联系。恩格斯说过：“没有理论思

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⑤中国革命战争，就其规模之巨大，时间之长久，情况之复杂，道路之曲折来说，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要研究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战争历史，揭示它的经验和规律，如果离开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必然会如堕烟海，迷失方向，不得要领。

毛泽东同志集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他不仅参加和领导了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整个过程，而且运用马列主义，从理论上概括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是研究我军战史的必不可少的理论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既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论著中，又表现在他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所起草的大量文电中。在这些军事论著和文电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特别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更是研究我军战史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等等，是研究我军战史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作战原则、作战方针和对历史事件的结论，如十大军事原则，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对红军几次反“围剿”斗争的评价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战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深刻领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照搬现成的结论，把战史研究当作给经典著作写注释；也不是说我们要把那些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结论当作衡量是非的标准。同时我们也不认为，毛泽东同志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能讲。恰恰相反，有些经验，前人没有讲到，我们加以提炼和概

括，这正是后人研究战史的一种责任。

毛泽东同志为了指导战争所起草的大量文电，一部分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还有许多尚待进一步整理和发掘。这些文电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战史的珍贵资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文电中，有战略指导的，也有战役或战术指导的。这些文电，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科学的预见，惊人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现在读起来，还常常使人惊叹不已。当然，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受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范围的限制，尤其是因为战争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的活人，而又互相保守秘密的缘故，主观指导和客观情况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经常随着对情况的深入了解而修正自己原来的认识，他也不止一次地采纳下级指挥员的正确意见，而放弃自己原来的主张。我们在研究战史的时候，必须把毛泽东同志的文电和中央军委其他的文电以及下级指挥员的文电结合起来分析，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了解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并根据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战略指导和重大战役指导的经验时，必须真正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电的内容和精神。例如：我们研究淮海战役的作战指导，就要研究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分析形势，抓住战机，定下决心的？是怎样在敌我双方兵力大体相等的条件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是怎样随着战局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计划、扩大战役规模的？是怎样关照各战略性战役之间，战役的各阶段之间的联系的？是怎样关照战役的作战行动、后勤供应、兵员补充、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弄清了这些问题，再联系战役指挥员的实际指挥和作战经过进行分析，就可以从中总结出这次战

役的经验教训。

在我军战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杰出作用，同时又一贯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是亿万人民群众和千百万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鲜血和汗水谱写而成的。在这个集体奋斗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站得高，看得远，起的作用最大，没有哪一个人能同他相比。他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同时，评价又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军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过贡献。党的领袖是一批人，不能单讲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还要肯定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用。讲领袖的作用时，不能超越人民群众的作用。不能把领袖放在党之上，而要放在党之中。不能光讲个人领导，而要肯定党的集体领导。在研究我军战史时，不能以领袖为中心，而要以我军的战争实践为中心。在讲作战指导时，不能把领袖神化，而要以事实作准绳，用实践去检验。

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来指导我军战史研究，就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努力掌握它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涉及了军事、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各个领域，它和毛泽东思想的其他各方面的内容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军事著作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写成的，自然会带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在不同的时期，提法也就有所变化。针对的问题不一样，强调的侧重点也就不同。所以，我们切

不可抓住它的只言片语，就作为研究的根据，而必须弄清它的内在联系，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军战史研究。

三、要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历史条件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在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时候说：研究党史，要运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把这种方法叫做古今中外法，并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同志说的是研究党史的方法，研究我军战史，同样应该采取这种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

研究我军战史，不可避免地要对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出评价，要判明它的性质和意义，分清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任何事件总是同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对历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又有一个怎样正确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是为了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是为了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作为当前工作的借鉴。研究这些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不能用今天的条件去看待历史事物，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这和毛泽东同志讲的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要求我们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发生

那个问题的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把问题放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透过现象认清本质，得出正确结论。如果脱离了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去看问题，那不仅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而且有些事情甚至是不可理解的。例如：根据地的扩大，一般是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而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后，却决定采取“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了东征战役。这是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万多人。陕甘苏区地瘠民穷，人口稀少，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更是由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而华北五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条件，又最有利于红军的扩大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红军渡河东征，既可以迅速扩大自己，又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抗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同时也可以解决陕甘苏区所存在的种种困难，尤其是经济困难，以求得巩固。尽管东征战役的胜利以及后来的战争实践已经证明了采取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但是如果我们不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当时全国形势和各方面的情况，那末对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方针，仍然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也不可能从中作出科学的经验总结。又如：对打百团大战，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无论就战略或战役说，都是对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战役上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在战略上是错误的或失算的。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也只有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全国政治、军事形势，敌、我、蒋三方的各种情况，分析了这一战役对后来战局的影响，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历史研究，要求把事物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研究。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运动，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经历了一个

由产生、发展到结束或转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研究问题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在战争过程中，所以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是因为战争双方的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分析历史事物，不是只分析一时一地的历史条件，而是要分析整个事物发展过程的历史条件，弄清这一事物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变化的。例如，研究我军作战形式问题，就要研究我军是怎样由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向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的，在抗日战争中又为什么实行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在解放战争中又怎样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如何从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的。我们只有全面、具体地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或阶段的不同的条件，弄清这些转变的原因，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而正确地指导我军实现这些战略转变的，才能从中总结出如何灵活运用作战形式的有益经验，学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这些战略转变中所表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研究一个大的过程应该如此，研究一个具体的作战原则也应该如此。例如，我们历来“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但在一定历史阶段也提出过“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并重”和采取“半歼灭，半击溃”的方针。解放战争开始是打小歼灭战，后来发展为打大歼灭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是企图打大一点的歼灭战，后来又提出“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只有从当时的历史实际中，找出作战原则产生和变化的根据，才能深刻理解和阐明这些原则的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学会在不同条件下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

对于一次战役战斗，也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去研究。

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敌我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作战指导与作战实践不断地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作战过程中，人们主观指导的能动作用强烈地表现出来，而客观实践对于主观指导的检验又特别的和严酷。我们研究战役战斗的经验，就是要循着作战指导与作战实践循环往复的客观过程，弄清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依据实践的结果，去检验作战指导上的得失，从而总结出经验教训来。

我们只要真正弄清了过去经验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为认识这些经验在现代战争中的适用价值找到了依据。因为任何经验的适用范围都是由于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要了解过去的经验在现代战争中是否适用，就要把产生这些经验的历史条件和现代战争的条件进行分析比较，看它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根本性质的变化，还是局部性质的变化，还是处在量变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这些经验也就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如果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只是一些具体条件的变化，那么这些经验还是适用的，只是需要和新的条件相结合。例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由于我们的军队和战争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所以它的根本原理原则是仍然适用的。我军许多战略战术原则，都是在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这个条件下产生的，在未来战争中，我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将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所以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就其精神实质来说也是仍然适用的。当然，现在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具体原则就不适用了，有些原则需要研究如作在新的条件下运用。例如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所贯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但当时所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由于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未

战争初期，我们必须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全国的战略展开，所以，就不能一般地套用了。因此，仅就为了便于当前和今后作为借鉴来说，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注意把产生这些经验的历史条件研究和阐述清楚，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要坚持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要求历史研究坚持严格的科学性，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客观实际。同时，又要求史学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保持鲜明的无产阶级的党性，避免剥削阶级偏见的影响。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及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它是唯一需要和能够对历史不怀任何偏见的阶级，它没有任何私利蒙蔽自己的眼睛，因而最能坚持唯物论，面向实际，尊重历史。越是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全面地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便越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越有利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革命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党性同科学性，在客观上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它们人为地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是坚持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的典范，我们要以它为榜样，进行我军战史的研究。

坚持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原则，过去在“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下遭到践踏。人为的种种禁区、框框和迷信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转变，但“左”倾思想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怕“冒犯”，对“口径”，在应当深入探求的问题上踌躇不前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仍

是在战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摆脱禁区、框框、迷信的束缚，使战史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开展。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具有大公无私、革命风格。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无畏才能尊重历史，忠于史实，客观地探索真理，勇敢地捍卫真理。当然，在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时，创造良好的民主空气是必要的。事实证明，动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必然妨碍思想解放，窒息学术研究。然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忠于事实，坚持真理。古今中外许多有作为的科学家，为了追求和捍卫真理，而置责难，迫害、生死于度外，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成千上万的先烈，为追求革命真理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正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革命品格。怕字当头，患得患失，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即使弄清了某些事件的历史真面貌，求出了“是”，也不敢公然坚持真理；或者一味地照抄照搬，实行本本主义，什么探索、创新，通通丢到脑后去了。因此，大公无私乃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美德。失去了这种美德，就必然要违背无产阶级的党性，历史研究势必走上邪路。

坚持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不但要解放思想，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要勇于修正错误。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军战史研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研究中，常常由于占有材料的局限，给分析认识某些历史事件带来局限。即使是在史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往往由于理论水平、思想方法的差异，而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得出的结论，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也有错误或部分错误的，这种现象的存在既

不奇怪，又不可避免。重要的是要有克服局限、倾听异议的愿望和修正错误的勇气。囿于孔见，固执一端，是不可取的。它不是探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它和坚持真理毫无共同之处。在历史研究领域，即使是某些公认的正确认识，也具有相对正确的性质，还有待深化。由于新的史料的发现，也往往必须修正原来的认识。因此，在战史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历史事物的认识，随时摒弃认识的错误成分，使之尽可能地符合客观，接近真理，才是正确的态度。

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还要求我们在大胆深入地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为我们的研究工作规定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历史研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可喜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又要划清解放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如果我们曲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公开发表同党中央决议相违背的观点，公开发表危害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言论，这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说，科学无禁区，任何历史事物，包括党中央已作结论的重大事件，都可以大胆地深入地加以研究。通过研究，不仅可以印证、丰富、深化既有的认识和结论，而且可以揭示它的欠缺甚至错误。一旦发现党中央决议中存在某些欠缺或错误，就有责任向党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在党中央没有修改决议以前，即使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也不能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有关决议的观点。历史证明，我们党是有器量有能力纠正自己的任何错误的，对于历史事件评价方面的错误当然也不例外。历史事实不可歪曲，但准确的史实，是不是公开说，什么时候公开说，公开到什么程度，这也要考虑到并服从



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总之，史学工作者应当把对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公开发表言论、进行宣传区别开来，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坚持科学性和党性统一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他留给我们的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将指引着我们走向新的胜利。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提高我军战史研究工作的水平，为我军在新的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提供可靠的历史知识和依据。

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1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109页

③《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